

关于“童心论”与“教育工具论”的再反思

钱淑英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¹

摘要:“童心论”和“教育工具论”作为“十七年”儿童文学的重要理论话语,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新时期遭遇的命运各有不同。理论界对此展开的批判与反思,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童心论”和“教育工具论”分别指向的儿童立场问题以及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触及儿童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内核,仍有重新探讨的空间。它们在政治立场和儿童视角之间、教育性和趣味性之间产生的缝隙里,蕴含着从传统指向未来的历史反思价值。

关键词:“童心论”;“教育工具论”;“十七年”;新时期;历史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6)06-0044-07

谈及“十七年”儿童文学的理论话语,我们自然会想到“童心论”和“教育工具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童心论”遭到批判,“教育工具论”盛行一时;而在文革结束后,这两种观念又在重新评价的过程中拥有了相反的命运,前者被平反,后者被否定。这样的变化与反拨,与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关。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任何作家和批评家都受到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支配,他有接受、改变、拒绝的选择可能,但无法完全摆脱这种意识形态。

“十七年”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艺术规律的探索之外,承载了太多政治性的要求,这是当时儿童文学批评家们难以摆脱的命运。然而,当我们身处这一价值体系之外,又很容易形成极端的批评,认为艺术观念被政治运动所左右,是不可理解的行为。倘若我们从尊重历史的前提出发,站在今天的价值立场,对过去的文学时代进行客观分析与学理阐释,就可以避免非此即彼的简

单化判定。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儿童文学界对“童心论”与“教育工具论”的反思与讨论,似乎已经有了文学史的定论。然而政治目标与文学理念之间产生的缝隙,仍留给我们言说和探讨的空间。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所体现的对于儿童视角的倾斜,实际上就构成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儿童文学极具探讨价值的理论话语。不管外部的政治环境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理论与创作的现实形态,“十七年”儿童文学在观念的提出与实践的探索上都显示出了不容忽视的成效。因此,结合当下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再一次贴近“十七年”儿童文学的理论现场,既有必要,也有意义。

一、“童心论”:在政治立场与儿童视角之间

在“十七年”儿童文学理论话语中,“童心论”是一个不可不提的关键词。从学术概念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当时的儿童文学界并没有人对何为“童心论”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述,只是在彰显儿

* 收稿日期:2016-09-28

作者简介:钱淑英(1977-),女,浙江金华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等学校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十七年’儿童文学研究”(FX2013015)

童立场与儿童趣味时会运用“童心”的说法。这样的“童心”说被贴上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的标签后,就成为反动的理论观点而遭受批判。我们在此探讨的“童心论”,不仅仅指那场特定的文学运动所制造的概念符号,还包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和批评家围绕“童心”而展开的相关儿童文学观念阐释。

众所周知,陈伯吹被认为是“童心论”的代表人物,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两篇文章中,特别强调了儿童视角之于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在1956年发表于《文艺月报》的《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陈伯吹提出不能忽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而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具有教育的方向性,首先是要照顾儿童年龄的特征,他说“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2]²²1958年刊载在《儿童文学研究》上的文章《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则重在探讨儿童文学的编辑工作,陈伯吹在文中说“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的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而被发表和被出版的作品,很可能得到成年人的同声赞美,而真正的小读者未必感到有兴趣。”^[2]⁵

这种基于儿童立场和儿童情趣的论说,使陈伯吹被扣上了“童心论”的帽子,并在1960年受到猛烈地批判。《儿童文学研究》《人民文学》《文汇报》《上海文学》《文艺报》等刊物发表了贺宜、里方、蒋风、左林、沈澄、何思、徐景贤、宋爽、杨如能、张天翼、严文井等人的批判文章,认为陈伯吹的“童心论”是美国教育家杜威“儿童中心论”的翻版,不承认儿童带有阶级性,是宣传资产阶级观点的儿童文学理论,带有危害性。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文章大多站在阶级论的角度展开政治性的批判,没有真正触及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在这两篇被认为是提出“童心论”的重要文章中,陈伯吹并未系统建立关于“童心论”的理论体系,他只是站在儿童读者的角度,呼吁作家和编辑注

意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正如王宜清在《陈伯吹论》中所指出的那样,陈伯吹并没有什么“童心论”,他对“童心”没有进行针对性的专门论述,“儿童文学的特点”才是其立论的核心部分,落脚点在于时人对儿童文学创作理解上的偏差——不注意“儿童文学的特点”,因此,“童心论”是一些人对陈伯吹无中生有的“罪名移植”。^[3]

如果把“儿童文学的特点”定义为“童心论”,那么,在陈伯吹之前,严文井其实就已经提出了“童心论”。严文井在为《1954-1955 儿童文学选》写的序言中,曾说过与陈伯吹类似的观点:“怎样正确地理解少年儿童文学的特点对我们来说是极有必要的。……我们应当善于从少年儿童们的角度出发,善于以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耳朵,尤其是他们的心灵,来观察和认识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以及他们虽然没有普遍接触但渴望更多知道的那个完整统一而又丰富多样的世界。”^[4]同样地,冰心在《1956 年儿童文学选》的序言中也论及儿童的心理特征,甚至更为直接地用“童心”加以表述,她说“一个儿童文学作者,除了和一般文学的作者一样,必须有很高的思想水平、艺术水平之外,他还必须有一颗‘童心’。所谓‘童心’,就是儿童的心理特征。”^[5]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持相似的观点,却唯有陈伯吹被视为“童心论”的代表人物而受到批判呢?关于这个问题,刘绪源在《1960年,为何突然批判陈伯吹》一文中作出了理论推断。他认为,陈伯吹作为一个党外作家,不仅谈儿童文学的创作、编辑、出版、理论批评、教学、科研,还涉及整体的儿童文学的组织工作,如此高谈阔论,在当时很有可能犯了党内人士的忌讳。因此,这场“童心论”的批判,应该是“当年党内的宗派主义、极‘左’思潮、排斥党外知识分子、过分强调斗争哲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6]这一推论尽管缺少文献的佐证,却有一定道理。早先提出过类似观点的严文井,当年也和张天翼在《中国青年报》一起发表联名文章,代表作协上层的权威意见,对陈伯吹的“童心论”提出批判意见。

这样的批判,对“十七年”儿童文学创作自然会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不注意儿童文学特

点”这一创作上的偏差,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的艺术质量。茅盾在我们所熟知的《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的创作问题,同时也强调了儿童读者的接受问题。他认为,1960年的少年儿童文学中那些富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作用的作品,对于低年级儿童实在高深了一点,儿童的身心发育跳不出自然规律,这样的“拔苗助长”,后果未必良好。在茅盾看来,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字应当有它的特殊性,他说,仅从这一点上看,当年作品的质量是不如从前的,这也许是反“童心论”的副作用。^[7]

庆幸的是,这场关于“童心论”的批判运动很快就结束了,这与当时政治形势快速变化有关。文革结束以后,儿童文学界对陈伯吹“童心论”进行了重新评价。1979年6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举办关于“童心论”的座谈会。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的同志及部分儿童文学业余作者、儿童文学编辑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致认为,陈伯吹对儿童文学提出的这些看法,尽管有不尽完善和可商榷之处,但那纯属学术思想问题,不应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8]值得一提的是,主持这次会议的正是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的负责人陈伯吹先生,这前后的变化是多么耐人寻味。

文革结束之初,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和批评家们依然强调政治性,但他们开始从新的角度理解“童心论”。批判过陈伯吹的贺宜,在写于1960—1962年间的《小百花园丁杂说》中就曾对“童心”作过这样的阐释:“与其说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有童心,不如说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心中有儿童更妥帖些。”^{[9]268}后来贺宜也被戴上了“童心论”和“儿童本位论”的帽子,凡是他在《杂说》中批判和反对的东西,几乎都反过来变成了他的罪状。正因为如此,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贺宜对曾受“童心论”批判的陈伯吹有了惺惺相惜的情感,他在《小百花园丁随笔》中说:“陈伯吹同志所说的‘童心’,也许就是我在这里说的‘心中有儿童’‘热爱儿童的心’‘了解和熟悉儿童的心理’的意思。假使我的揣测是对的,那我就将为这个发

现感到格外的高兴。”^{[9]569}

总之,“童心论”作为“十七年”儿童文学时代旋律的一部分,它并非是陈伯吹一个人的主张,而是许多理论研究者共同的观点,也是很多作家创作时依凭的理念。只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这一理论观点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童心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其基于儿童立场的理论合理性。陈伯吹认为,得到成年人赞美的作品,小读者未必感到有兴趣,而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属于“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样的批评标准,对于当下儿童文学创作而言,仍具启发性。今天有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并没有在创作中体现真正的儿童视角,他们的作品,有很多属于“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也是我们重提“童心论”的意义所在。

二、“教育工具论”:在教育性和趣味性之间

在整个“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被定义为“教育儿童的文学”,这种极度突显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教育工具论”,构成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根本宗旨和原则。这一观点完全来自苏联。“儿童文学是教育的工具”是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讲过的一句话,“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个口号便是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工具论”发挥出来的,“十七年时期”的作家和理论家当时写文章、讲话都是用这两个口号。^{[10]71}鲁兵是“教育工具论”的代表人物,他在1962年出版的《教育儿童的文学》一书中说:“儿童文学历来是一定阶级的教育工具。可以说,有儿童,有儿童教育,就有儿童文学。不论哪个阶级都要对儿童进行教育,而且毫不例外地运用了儿童文学这一工具。当然,各个阶级都是以教育儿童成为符合自己的阶级利益的人为其目的。”^{[11]8}

这样的“教育工具论”随处可见。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内部理论刊物《儿童文学研究》中,刊载了很多强调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文章。常勇在《关于儿童文学的特点的一些补充》一文中指出:“儿童文学之所以成为儿童文学,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它的对象是儿童。谁都知道儿童比成人更需要受教育。……儿童文学之所

以区别于其他文学的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有明确的教育的方向性。在于它要具体地从各方面来教育年幼的一代。”^[12] 王国忠则在《儿童文学必须坚持共产主义教育方针》一文中,针对期刊杂志的方针变化,提出了更具政治性的教育要求。1957年初,《小朋友》和《少年文艺》重新修订了新方针,前者的目标是“通过生动有趣的艺术形象,启发儿童智慧,增进儿童知识,培养儿童活泼、勇敢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后者提炼出了“亲切、新鲜、多样、有趣”的八字方针。王国忠认为,两个杂志都将新鲜、有趣作为重要的选稿标准,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内容从方针中抽去,这与党教育少年儿童方针背道而驰,因此走入了歧途。在他看来,儿童文学作品必须注意到趣味性,但趣味性不是我们办刊物的目的,它必须从属于共产主义教育的原则,为这个原则服务。^[13] 这种唯政治论的判断,缺乏基本的学术立场,在当时却成为主要的舆论导向。因此,在反右和业务思想大批判的“群众运动”中,《小朋友》和《少年文艺》两家杂志因为包含“亲切论”“趣味论”的办刊方针,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教育是维系社会集团的纽带。”^[14]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共产主义教育方向的坚持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强调教育性而牺牲儿童情趣,的确使“十七年”儿童文学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作家和理论家们完全放弃了对趣味性的追求,即使是“教育工具论”代表人物鲁兵,也从不否认趣味性在儿童文学中的重要意义。鲁兵说“要使儿童文学作品为儿童所喜闻乐见,趣味性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反对抛弃思想内容的为趣味而趣味,提倡服从于思想内容的趣味性。前几年在批评为趣味而趣味时,由于没有把问题讲得很清楚,致使一些同志把趣味性当作是资产阶级文学特有的属性,这当然是大不妥当的。……趣味性应该和作品的思想内容水乳交融,它渗透在整个作品中,从情节、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各方面表现出来。”^[11]³¹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鲁兵在创作中也始终秉持这一原则,他的作品通过儿童视角显示出应有的儿童趣味,而非简单机械的说教的产物。

应该说,对于教育性和儿童趣味的双重追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并不在少数,很多作家对过度教育性导致艺术缺失都持以警惕态度。严文井就曾说过“不应该在作品里只见议论,不见形象,不应该用概念代替形象。这种对教育意义的庸俗的狭隘的看法除了助长在作品中进行枯燥的说教的倾向外,它的主要危害还在于限制了、缩小了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15] 在儿童文学教育特性这一问题上,作家们常常用比喻的方式进行形象化的表达。陈伯吹在提到某些为了解决教育问题而写的作品时说:“这类作品,为了赶任务而作,一般说来,都写得简单化,表现力不强,里面的教条一触即到,就像破衣服里钻出了棉絮来。”^[16] 贺宜在谈到童话创作时,则借鉴波列伏依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说过的几句话“儿童文学一定要有教训,可是这教训应该和作品本身水乳交融,和它的人物形象血肉相连,应该用合适的辞汇来表现,而不要浮在上面,就像拙劣或偷懒的主妇所煮的汤,上面漂着一滴一滴的油那样。”^[17] 这样的表述,在今天读来依然觉得准确生动,给人以启发。

因此,我们对于“教育工具论”的认知,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符号指向的概念表层。笔者以为,“十七年”儿童文学作家对于教育功能的强调,是和“儿童趣味”的理想诉求联结在一起的,只是由于外在政治环境以及作家艺术才华的限制,才使得儿童文学创作整体上出现了严重的说教意味。因此,到了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和批评家们不得不对这样一种错误倾向进行反拨。

陈子君曾在《儿童文学理论需要更多地注意典型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提到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问题。在1983年8月西安举办的两个儿童文学讲习班上,陈子君说“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是肯定需要的。但是单说教育作用则不全面,不能阐明文学艺术的全部功能。”他还同时提到,1983年10月在郑州开幼儿读物出版工作会时,过去一直坚持“教育儿童的文学”观点的鲁兵,也主动公开宣布他的这个提法是不够妥当的,表示已经放弃这个口号。而在1984年6月石家庄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上,鲁兵在发言中又进一

步表示,他的“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七个字,应当改成“教育、儿童、文学”这六个字。^{[10]72}理论界对于儿童文学教育性问题的理解,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并且形成了基本共识。我们承认,儿童文学有着不容忽视的教育价值与功能,不能一味地排斥或否认,但教育不能凌驾于审美之上,成为评判儿童文学艺术的第一标准。

客观地说,“十七年”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家在理念上并没有放弃对艺术性和趣味性的追求,只是因为受限于政治大环境,难以把握教育性和趣味性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创作上的缺憾。如今,我们对于儿童文学与教育关系的认知,不再是一边倒的极端态度。正如任大霖所说“儿童文学界大可不必再在‘儿童文学要不要教育作用’‘儿童文学应不应具有教育性’这类问题上继续争论不休了,因为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具有审美、教育、认识、娱乐这些功能是大家都承认的。”^[18]在任大霖看来,只要是一个爱护儿童的人,总希望对儿童有点益处。这话说得不错。一个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必定是从心底里热爱孩子的,他们只要拥有足够的文学才华,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有益于儿童心灵的好作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如此,今天的作家也是如此。

三、历史反思: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当泛政治化的文艺观点统治着儿童文学领域的时候,“一切试图揭示和尊重儿童文学自身规律的理论观点便只有被批判、被扫荡的厄运,而儿童文学创作,也只有朝着一条非文学的轨道滑去了”。^{[19]336}应当看到,尽管“童心论”和“教育工具论”对儿童视角的彰显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无法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它们无法为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造走向未来的艺术美景。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又应当承认,“十七年”儿童文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到政治的牵制,另一方面又涌现了一批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这一现象特别值得我们研究。朱自强认为,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在建国八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他还

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可读性、趣味性上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是值得中国儿童文学记取和借鉴的。”^[20]总结这其中的经验,一方面是因为一批优秀作家基于政治理想对儿童文学的真诚投入,另一方面归功于评论家们对儿童文学特点的重视与探索。“童心论”追求儿童趣味,“教育工具论”强调对儿童的教育作用,不管两者的目标指向有何不同,其关注焦点都在于儿童自身,这与当时儿童文学创作突出儿童特性是相一致的。

上文已提到,文革结束后儿童文学理论界面对“童心论”和“教育工具论”的态度,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截然相反。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此有着更为全面的阐述,从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两种观点都有所涉及的陈伯吹,进入新时期以后,在两方面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意见。自1979年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进行“童心论”座谈之后,《儿童文学研究》从复刊后的第三辑开始,连续刊载有关“童心论”的座谈纪要和讨论文章20多篇,普遍认为这一罪名是非正常政治批判的结果,而所谓的“童心论”,其实就是儿童文学的特点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这样的探讨和反思,带有一种为蒙受冤屈者及其理论观点进行政治平反的意味,尤其为“童心论”的代表人物陈伯吹恢复了名誉。而关于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与前文我们所提到的经历“十七年”这一历史阶段的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不同,年轻的评论家们站在捍卫文学的立场,对传统的儿童文学观提出了挑战。陈伯吹在1987年和1988年先后发表《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和《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两篇文章,指出近年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再一次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特性。这一观点遭到方卫平和刘绪源两位学者的反对,他们分别发表文章进行论争,前者对“教育儿童的文学”的观念展开了批判性反思,后者则主张“文学的本质只能是审美”,并由此提出不同的意见。^{[19]372-378}

以方卫平和刘绪源为代表的新锐学者,站在历史的角度和审美的立场,表达对儿童文学“文学性”的坚守,成为新时期以来推动儿童文学本

质探讨的重要观点。而理论界继续推进的“儿童本位论”在“童心论”之后成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观念和创作形态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是对“十七年”理论话语加以反思的理论成果。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会看到,很多人对“十七年”儿童文学,依然持简单的否定的态度。

钱谷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写的《作家·批评家·批评》一文中指出,在社会前进的步伐较为缓慢的时代,批评家的眼光容易倾向于过去,他们常常会从过去的传统中去选定他们据以批评的条条框框,而在革命的时代,或是社会前进的步伐较为迅速的时代,他们就会瞩目着未来,根据时代的理想,生活的要求,来制定一些新的条条框框。在钱谷融看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无疑处在社会前进的步伐较为迅速的变革时代,这样的时代有利于艺术的发展,但批评家们却容易出现这样的偏向,即“以一种轻率浮躁的态度来对待条条框框,既容易随便的否定旧框框,也容易随便的制造新框框。”^[21]如果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是属于社会快速发展的变革时代,那么,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更是属于革新的时代。如此来看,新时期儿童文学界对“十七年”儿童文学进行批判和反拨时,有可能在一种新、旧变换的“逆向性”批评中,出现相似的思维方式。任大霖的小说《蟋蟀》在不同时代遭受不同批判,就说明了这样的问题。^①

关于历史反思的“逆向性”思维,董之林在《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中有所阐述。董之林认为,对“十七年”儿童文学的理论反思,应当真正放置在科林伍德关于历史哲学的“反思”论点中,即对某一种观念的反思,并不是简单地把以前说好的现在说成“坏”,把以前说坏的现在说成“好”,因为“简单地把一种逆向性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方法论来评定一个时期的文学史,实际上不仅不能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使研究在原有方寸之间循环往复”。^[22]的确,真正的“反思”,不仅是社会和文学对未来的想象,也包含对传统的回眸,这样才会产生阐释历史的新的可能性。因此,当我们再次回望政治运动频仍的那个时代,面对政治性占主导

地位的“十七年”儿童文学,不应只是全盘的否定和无情的批判。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出,“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连续体’。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与因果关系。人类的‘现在’总是在‘过去’形成的既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人类的‘未来’也总是在人类‘现在’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过去的社会结构、它的发展进程与机制,往往可能限制与影响人类未来将发生的事件。”^[23]如果我们把“十七年”儿童文学与当下的儿童文学现状相结合,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前后关联的问题。如今我们依然在倡导的“儿童本位论”,以及对内涵放大后的教育价值的全新接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童心论”与“教育工具论”的扬弃与发展;而当下童书市场所导致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的趋势,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儿童文学传统所强调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使命感与读者意识的缺失。我们唯有始终保持批判意识与反思能力,将历史的脉络从传统延展到现在乃至未来,才有可能对很多问题做出合理判断。在笔者看来,“童心论”和“教育工具论”分别指向的儿童立场问题以及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触及儿童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内核,仍有重新打量和思考的空间,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注释:

①任大霖在《蟋蟀》中花了大量篇幅表现儿童玩蟋蟀的种种情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评论家和读者批评该作品“丑化新中国儿童形象”;到了新时期,作家又因为描写儿童学习农业劳动而被认为在作品中反映了“落后反动的儿童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用“逆向性”思维进行儿童文学历史评价可能导致的问题。具体论述参见拙文《如何看待任大霖的儿童文学观——由〈蟋蟀〉〈我的朋友容容〉引发的批评所想到的》,载《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6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
- [2]陈伯吹.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M]//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
- [3]王宜清.陈伯吹论[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329.

- [4] 严文井.《1954-1955 儿童文学选》序言[M]//王泉根.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 南宁: 接力出版社, 1996: 207-208.
- [5] 冰心.《1956 年儿童文学选》序言[M]//王泉根.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 南宁: 接力出版社, 1996: 218-219.
- [6] 刘绪源. 1960 年, 为何突然批判陈伯吹. 南方周末[N]. 2012-05-10(E24).
- [7] 茅盾. 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M]//王泉根.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 南宁: 接力出版社, 1996: 226.
- [8] 佚名. 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座谈“童心论”[M]//王泉根.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 南宁: 接力出版社, 1996: 420-422.
- [9] 贺宜. 小百花园丁杂说[M]//贺宜. 贺宜文集(5).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8.
- [10] 陈子君. 儿童文学理论需要更多地注意典型问题的研究[M]//陈子君. 儿童文学论.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5.
- [11] 鲁兵. 教育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讲座之一[M].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
- [12] 常勇. 关于儿童文学的特点的一些补充[J]. 儿童文学研究, 1958(5): 30-31.
- [13] 王国忠. 儿童文学必须坚持共产主义教育方针[J]. 儿童文学研究, 1958(6): 1-9.
- [14] 罗贝尔·艾斯卡尔皮. 文学社会学[M]. 符锦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122.
- [15] 严文井.《1954-1955 儿童文学选》序言[M]//王泉根.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 南宁: 接力出版社, 1996: 208-209.
- [16] 陈伯吹. 论“童话”[M]//陈伯吹. 儿童文学简论.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2: 172.
- [17] 贺宜. 目前童话创作中的一些问题[M]//贺宜. 贺宜文集(5).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8: 141.
- [18] 任大霖. 代序. 我的儿童文学观[M].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5: 20.
- [19] 方卫平.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M]. 南京: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3.
- [20] 朱自强.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306.
- [21] 钱谷融. 作家·批评家·批评[J]. 上海文学, 1962(7): 59-60.
- [22] 董之林. 热风时节: 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下[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243.
- [23] 余志森.《史学家: 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中文版序[M]//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史学家: 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马俊亚, 郭剑英,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5.

Further Reflection on “Childishness Theory” and “Educational Tool Theory”

QIAN Shu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Childishness Theory” and “Educational Tool Theory”, which are theoretical discours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experienced different fates in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and the New Period. Theoretical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the two theories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social ideology at that time. “Childishness Theory” and “Educational Tool Theory”, respectively pointing to the problems of children’s standpoi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touch the basic core of children’s literary theories, which could be re-explored further. The two theories contain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reflection from the tradition to the future on the gaps between the political stance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 and between being educational and being interesting.

Key words “Childishness Theory”; “Educational Tool Theory”; “the Seventeen Years”; the New Period; historical reflection

(责任编辑 傅新忠)